

## 【哲学研究】

#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敬峰 刘俊

**摘要:**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综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关键词:**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朱子;辩难;经世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9-0122-07

缘于乾嘉汉学的强势挤压,程朱理学一度从清初的鼎盛转入凋敝式微的境遇。而后随着乾嘉汉学的没落,程朱理学亦在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迎来再度复兴,形成一股强势的“理学中兴”思潮。而这一思潮在理学传统较强的湖南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一大批尊奉理学为圭臬的学者,如唐鉴、曾国藩、罗泽南、郭嵩焘等,他们既是主导晚清政治格局的重要一脉,更是复振晚清程朱理学的中流砥柱。换言之,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重镇在湖南,而湖南程朱理学的中心则在包含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他们既是理学名宿,亦是政坛巨擘,在学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程朱理学的中兴。而这其中,尤以郭嵩焘较为典型,缘由即在于他是循着汉宋兼采的思路,以批判性继承的方式在程朱理学的营垒里清理门户,用“就朱订朱”的方法裁断朱子学说<sup>[1]</sup>,以期从更高层次上尊朱,着意开掘经学的治世维度。这就与同时代的“奉一先生之言而据之以为是”<sup>[2]</sup>的学者拉开距离,显豁出其求真求是的治学旨趣。郭嵩焘这

一学术取向在其倾心著述的《大学章句质疑》当中得到淋漓尽致体现,因为《大学》最能整全地显豁儒家内圣外王之旨;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章句》是朱子用心甚笃、用功最勤的著作,以此切入既能剑指朱子学的核心内容,亦能彰显郭嵩焘回应朱子学的极致,更能由小见大,一窥晚清的学术样态,成为晚清复杂多变的学术格局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 一、《大学章句质疑》的撰写缘由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学名先杞,后改为嵩焘,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早年曾入曾国藩幕府,襄赞军务,成为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后出使英法,成为清政府首任外交公使。郭嵩焘绝非是单纯的官僚型士大夫,他一生笃志理学,注经解经,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中流砥柱。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郭嵩焘既以复振理学自居,何以又质疑朱子的《大学章句》,撰写《大学章句质疑》呢?这就

收稿日期:2021-07-19

\*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关中朱子学研究”(2022C004)。

作者简介:李敬峰,男,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西安 710119),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职博士后(上海 200062)。

刘俊,女,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1)。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晚清的学术背景。我们知道,早在晚明时,已经出现“由王返朱”的思潮,程朱理学渐趋从阳明心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至清初康熙时期,再度跃居庙堂之上,成为一时显学。然好景不长,乾嘉汉学的异军突起,出现“从事于词章十之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sup>[3]</sup>的情形,相应带来的后果就是“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sup>[4]</sup>。程朱理学再度被边缘化,跌入低谷近百余年。但随着乾嘉汉学流弊的不断显现,“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sup>[5]</sup><sup>26</sup>,其已无力回应晚清的社会关切和内生危机,完全成为皓首穷经之业,无补于浇漓之世道。是时学人吴廷栋在反思这一时弊指出,“正学不明而积渐至此也”<sup>[6]</sup>,蒋琦龄说,“正学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sup>[7]</sup><sup>1433</sup>。既然是学术不明导致的,那就必须倡明正学,而这正学就是程朱理学。清儒李元春就说,“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sup>[8]</sup>,所以必须“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sup>[7]</sup><sup>1433</sup>。在学者的呼吁下,重新标揭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上至庙堂下至民间的共识。同治皇帝明令天下道:

各直省学政等躬司臆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使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sup>[9]</sup>

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这道旨意直接将程朱理学拔擢至朝廷功令,推动是时学风的转向,那就是“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为之一变”<sup>[5]</sup><sup>26</sup>。郭嵩焘正是在汉学式微、宋学日昌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其《大学章句质疑》创作的。这样的学术背景能交代郭嵩焘将学术旨趣聚焦在宋学,但仍然无法说清楚郭嵩焘何以不是羽翼而是质疑朱子。细究之下,这一方面与湖南理学群体确立的“汉宋兼采”基调有关,如湖湘理学集团的典范人物曾国藩就指出: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彼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sup>[10]</sup>

可见,曾国藩对汉、宋之学互相排挤是极为不满

的,主张应该相济互补,不能偏废其一。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赖其卓绝的政治地位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影响着整个湖湘理学集团的治学旨趣。作为辐辏于曾国藩周围的核心成员,郭嵩焘受其影响自是情理中事。这就决定了郭嵩焘不可能完全以宋学为是。故而在《大学章句质疑》序言中直接交代了其何以质疑朱子的缘由:

《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辨争盖皆求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力行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朱子之言理后人无能有易也,而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可以言学而不可以释经。稍因朱子章句就经以求其义,而后此经之微言大义以明,即朱子之言唯其所以附丽之而精神愈出。尊经也,亦即所以尊朱子也。<sup>[11]</sup>

在郭嵩焘看来,《大学》原文义理完备,学界之所以纷争不断,就在于不能领会文内之义,全是在文外打转,尤其是以《大学》本义去将就朱子,致使《大学》本义不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郭嵩焘对朱子的否定,他同样高赞朱子诠释《大学》所透显的独到视野和不易之理,不足的是朱子用力太过,走向极端,背离《大学》本义太甚。因此,必须以《大学》本义为基准,裁断朱子之言,祛除朱子章句中的不实之论。这恰恰是一种尊经的态度,是合乎朱子的初衷的,绝不是冒犯朱子,反倒是尊重朱子。当然,在回应友人的善意提醒,也即“‘质疑’字有意设难,启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属改为‘补注’等字”时,郭嵩焘不为所动,反而指出“补注”二字与自己立论之初衷不合,婉拒提议。郭嵩焘这一治经取向显豁出其客观、理性的态度,与同时期那些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学者拉开距离。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郭嵩焘的《大学章句质疑》在《大学》文本上,以《大学》古本为基础,先抄录《大学》古本文本,然后再附以朱子的解释,最后加上自己的案语,显示出其兼采汉宋的治经主张。故而受到王先谦的高度赞赏:“先生此书还古本之旧观,息数百年之辩争,使大义粲然复明于世,为功于学术治道甚钜。”<sup>[12]</sup>足见此书之不俗。

## 二、文本质疑

文本无疑是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文本的不同

直接影响着思想的选择和归属,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郭嵩焘以“汉宋兼采”为进路,就必然决定着其要在版本、篇章等汉学视域内与朱子较量一番,这亦与其“以所得训诂古义寻求义理之所归”<sup>[13]27</sup>的一贯治经宗旨相吻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郭嵩焘对《大学》版本的择取:

《大学》原本次序最为倒乱,于义无取。程子以《大学》为有错简,盖亦有由来矣。明道移“克明德”至“止于信”,于“则近道矣”下,移“听讼”节于“节南山”节下,至伊川始定为今本,而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语犹莫知所属。朱子别为章句,于经文两言“此谓知本”,以其一为衍文,学者至今宗之……皆各以其意改定经文……安溪李安贞公《大学古本说》直以首章总论大意而归重格物之指,次章申释意之义,所见又各不同。<sup>[13]729</sup>

郭嵩焘言简意赅地列举和评述以往学者如二程、朱子、董槐、秦笃辉、黄扇、李光地等在《大学》文本和结构上的调整,虽然都是“各以其意改定经文”,但郭嵩焘最为钟情的则是李光地的《大学古本说》,他认为完全应该“以安溪(李光地)之说为断”<sup>[13]729</sup>,缘由在于李光地“以开章四节通论《大学》,而于‘知止’两节先透出‘致知诚意’之相因,以明《大学》之本,章旨极为完密”<sup>[13]730</sup>。当然,郭嵩焘只是借褒扬李光地来为其推崇古本《大学》张目。由此,他自然不能同意朱子对《大学》的经、传之分,认为“《大学》本无经传之分”<sup>[13]729</sup>,朱子此举实乃是让经文将就己意,绝非推究经学所应秉持之态度。不唯如此,郭嵩焘认为朱子对《大学》划分经传所衍生出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分经传而以曾子传孔子之言为经,门人述曾子之言为传,似属以意拟之。”<sup>[13]730</sup>《大学》的作者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涉及归属何种学派乃至思想定位,甚至正统抑或异端的关键问题。学术史上既有主孔子所作,又有主子思所作,亦有主曾子所作,更有如朱子划分经传以分属孔子、曾子。郭嵩焘因不赞同朱子划分经传,自然也就难以认同朱子对《大学》作者的判定,反而赞同程颐的孔子所作之论。他说,“程子云‘《大学》,孔氏之遗书’极允”<sup>[13]730</sup>,也就是说,郭嵩焘是力主《大学》为孔子所作的,朱子分属孔子、曾子实是一己之私意,毫无文本和义理的根据可言,故不足信,亦不足取。

既然朱子的经传划分不合理,那就必须对《大学》的文本结构做出新的划分,以使其血脉贯通,义理通畅。郭嵩焘的划分如下:

第一章:“《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也就是朱子所谓的《大学》经部。这一章主要是“首明《大学》之旨,归本诚意致知,而先释致知之义”<sup>[13]735</sup>。

第二章:“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这一章解释诚意。

第三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一章主要是来解释正心修身。

第四章:“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这一章解释修身齐家。

第五章:“《康诰》曰”至“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一章解释齐家治国。

第六章:“所谓平天下”至“以义为利”。这一章解释治国平天下。

很明显,郭嵩焘依据古本《大学》将《大学》划分为六章,每一章依次对应“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这与朱子的传十章分别对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不同。

在《大学》是否有阙文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大学》是否要增加“格致”补传这一焦点上,郭嵩焘实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他说:

朱子章句改定《大学》古本,而补格物致知一传,以发明圣功之要……而尤以格物致知为圣学之基。以圣经有所未详,补明其功,朱子之用心勤矣。嵩焘少读是书,求之诸儒传记,或有异同,则亦窃以补经为疑……读之既久,而后知《大学》一书于致知、诚意二者实已反复推明,穷竟其义,无复余蕴。又窃疑《章句》之书,纲领条目之分疏,未足以贯通圣经之全,而或失之纤曲。<sup>[13]760</sup>

可以看出,郭嵩焘早年对朱子格物补传是相当赞同的,不惜溢美之词,高赞其补明圣学之功。但随着知识的增益和体会的加深,他渐悟朱子之非,认为朱子此举未必能整全和客观地彰显《大学》之义,反倒落入细密曲折之窠臼。故而他指出:

郑注以致知在格物,别为一节。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在而不曰先。自诚意章以下,首言所谓修身在正其心,齐家治国诸章并同此例,疑



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结之。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朱子所补格物致知一章之义,经文本自无缺也。<sup>[13]733</sup>

郭嵩焘驳斥朱子的逻辑是这样的:格物即是致知,并非格物之外又别有致知功夫,而物不过是明德、新民事,这就是对格物的解释,原文已具,根本不需要像朱子那样进行补充,这纯属画蛇添足之举。很显然,郭嵩焘的思路和大多数否定朱子格物补传必要性的理由均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文内已有解释,无须再另作补传。这就彻底否定了朱子格物补传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受乾嘉汉学余波的影响,郭嵩焘亦多次指陈朱子在《大学》名物制度上的训诂之失,我们试举几例以显其义。如在对“大学”的释义中,郭嵩焘指出:

大学自对小学言之,即《王制》天子辟雍、诸侯泮宫之学也。三代立教必于学,而天子之学谓之大学。《释文》大,旧音泰者是也。太学者,成人之学。章句云:大人之学,似此学以人为名,恐非圣人所以发明三代立教之旨。<sup>[13]731</sup>

郭嵩焘与朱子的相异之处在于:一是大学之“大”应当读太学,而不是朱子所主张的读“如”;二是大学应该解释为成人之学,而非大人之学。原因在于解释为大人之学容易将其理解为有特定受教对象的,不如“成人之学”完备。可见,郭嵩焘完全是因袭郑玄之义而来的。再如对“格物”的解释,郭嵩焘指出:

《尔雅 释诂》:格,至也。此格字本义。须是穷究到至处,引申为度,格凡物到至处,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义。<sup>[13]734</sup>

这就是说,朱子训“格”为“至”乃是渊自《尔雅》,但郭嵩焘认为这并不完备,因为“格”虽然是穷究至极,但也有个限度,因此“格”应该含有“至”和“度”两个意思。在《大学章句质疑》中,诸如此类字词义涵、名物制度的考辨不胜枚举,旨在矫正他所认为的朱子之误,虽然未必就准确无误,但显示出其深受乾嘉汉学“以古为是”和“不易经典”两个学派律条的影响。

至此,郭嵩焘从《大学》的文本、作者、篇章、结构和训诂全面驳斥了朱子之非,将其“读经书必自训诂始,学问本原必由于此”<sup>[14]</sup>的治学原则加以强力贯彻,尤其是对朱子精心构思的格物补传也予以否定,显示的是回归原始经典、吸收汉学成就、革除

朱子过密之论,以还圣经之旧的经学取向。实际上,这里隐含的是郭嵩焘在考据和义理之间所做的权衡,那就是义理的得当必须建基于训诂的合理。

### 三、义理质疑

围绕文本方面的质疑只是郭嵩焘矫补朱子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因应时变从义理完成对朱子的纠偏。在郭嵩焘看来,朱子的《大学章句》主要偏差在于:一是将“格物”作为《大学》的统领性、首出性功夫;二是没有整全地揭示《大学》内圣外王的要旨,失于偏颇。就第一方面来讲,也就是何谓《大学》的第一要义问题,朱熹曾说,“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sup>[15]</sup>,这就是把“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核心要义,原因在于它“关系到一切理学体系的着眼点——为学之方,又是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归宿”<sup>[16]</sup>。但后来王阳明并不赞同朱熹此论,着意标出“诚意”来替代“格物”,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sup>[17]</sup>,旨在将“诚意”作为《大学》的统领性、第一义功夫,用“诚意”来规范“格物”,以期使“格物”在“诚意”的框架内展开,将“格物”完全转向内在,落实在德性伦理之内,提防朱子“格物”滑向单纯的知识化一边。很显然,朱子强调的是格物在《大学》功夫体系中基础性地位,而心学强调的是诚意在《大学》功夫体系中的统领性地位,前者是先格致,后诚意,次序井然,不容躐等,后者则是以诚意为范导格物,格物只不过是达至诚意的手段,它要从属、服务于诚意,而不能逸出诚意内容之外。而郭嵩焘则独辟蹊径,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致知、诚意二者实为入学之要义。”<sup>[18]729</sup>“《大学》之旨,归本诚意、致知。”<sup>[18]735</sup>很明显,郭嵩焘是不同于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纲领功夫的,反倒与阳明重视“诚意”和“致知”的意思相近,主张致知、诚意为《大学》的根本功夫和核心要旨。只是,他们提揭和重视的理由不尽相同。不唯如此,郭嵩焘更是以“致知—诚意”的结构来取代朱子“明德—新民”的结构。郭嵩焘何以提出这样另类的解释呢?细究起来,郭嵩焘主要从三个相连而又一体的维度展开论证。

从篇章结构来讲,郭嵩焘指出:“首章言致知而以知本结之,此章言诚意亦以知本结之,正见致知诚意皆圣学之本。”<sup>[18]744</sup>在郭嵩焘看来,《大学》第一章也就是朱子所谓的经部分,其核心要义要落实到

诚意、致知上,且第一章主要是来解释致知的,第二章是解释诚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篇末结构高度一致,皆以“知本”结束。这恰恰印证他所说的诚意、致知为《大学》根本功夫的主张。

更进一步,他指出:“《大学》开端说个知止,而推言始终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于天下,穷究到致知诚意,以显明德新民之实功,大义微言毕具于此。”<sup>[18]735</sup>如果说在上一段引文中,郭嵩焘只是笼统的说法,而在这一段中,郭嵩焘则深入到文本当中,认为在第一章中,《大学》虽然首先提出明明德于天下,但必须到致知诚意,才能彰显明德新民的功效。郭嵩焘这一指陈实际上将致知、诚意作为明德、新民的前置条件,凸显了致知、诚意的枢纽地位。另外,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来讲,我们知道,在朱子那里,“致知”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格物”的结果而已。但郭嵩焘却并不认同此说,他指出:“格物者,致知之功也。”<sup>[18]732</sup>“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在’而不曰‘先’。”<sup>[18]733</sup>很明显,郭嵩焘颠覆朱子的看法,主张“格物”即是“致知”,“格物”并不独立于“致知”之外,“格物”不过是“致知”的手段和功夫。这就与朱子之意恰恰相反<sup>①</sup>。他更为明确地指出:“章内知止、知所先后与下知本,皆吃紧归到致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大学》之首功也。”<sup>[18]732</sup>郭嵩焘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章中的所牵涉的“知止”“知所先后”以及“知本”中的“知”皆与“致知”中的“知”是同一意思,且它们最终皆要落脚到“致知”上。也就是说,“致知”实际上与“诚意”构成了统领《大学》的纲领。

再就“诚意”来讲,在朱子那里,他并未赋予“诚意”特殊的地位,反倒是阳明一意将“诚意”拔擢,在这一点上,郭嵩焘实际上倒与阳明之意相近。他指出:“《大学》之要,至诚意而极矣。故曰:‘必诚其意为圣功揭示第一要义,不可轻易看过。’”<sup>[18]738</sup>这就是说,《大学》的义理只有到“诚意”时才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故而“诚意”才是提揭圣学的首要功夫。当然,郭嵩焘拔擢“诚意”的理由与阳明并不相同,阳明是出于矫正朱子偏于外向之病,而试图通过“诚意”来凸显儒家心性之学的优先性和第一性,从而扭转朱子的逐物于外。而郭嵩焘的理由是:“诚意之始事,即在至于至善,家国天下之事同而修身其本也。”<sup>[18]735</sup>“明德新民之所以止于至善者必归本于诚意二字,所以为《大学》之统宗。”<sup>[18]739</sup>这里,

郭嵩焘是从诚意与“三纲领”的关系来论述“诚意”的重要性的。他认为不仅“止于至善”是“诚意”的入手功夫,更为重要的是,“明德”“新民”之所以要达至“止于至善”,完全是由于“诚意”,因此“诚意”自然是《大学》的统领。这实际上就有将“诚意”置于“三纲领”之上的嫌疑。

至此,郭嵩焘完成了以“致知”和“诚意”作为《大学》之两翼的论证。当然,“致知”和“诚意”绝非是两条平行线,它们是这样的映照关系:“诚意者又为圣学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诚意,尤必诚意乃能致其知,《大学》之精蕴正须熟读深思而自得之。”<sup>[18]733</sup>在郭嵩焘这里,“诚意”与“致知”不可偏废,具有同等的地位,前者是“行”,后者是“知”,能“致知”方能“诚意”,反过来,能“诚意”才能“致知”,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发。这虽有朱子思想的印迹,但意思已经大相径庭。

就郭嵩焘质疑朱子的第二点内容来讲,郭嵩焘认同《大学》是最整全地体现儒家内圣外王之旨的。但朱子却偏重于心性之学,影响所及,致使《大学》的外王一面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地,无力回应现实关切。而处在风风雨雨飘摇的晚清,如何推阐《大学》的经世维度以解决时弊,自然成为郭嵩焘纠正朱子的重心。我们知道,《大学》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者主要面向的外王和经世。就“齐家”来讲,在朱子那里还没有将其与经世之学直接打通,更多局限在伦常之内,而到郭嵩焘这里,则赋予“齐家”别样的意味:

齐家、治国皆须有教。教成于家者,无他,孝、弟、慈而已矣。尽一家之人统于是三者,而其条理节目亦须逐渐涵濡,如语言行动,必依于理,自是成教之本。教成于身而父子兄弟尊卑上下之则,由家以推之国,无二理也。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之所以齐其家者,固自有事功在也。<sup>[18]746</sup>

郭嵩焘是认同朱子所讲的家国一理的,主张以教化的方式,将孝悌慈由家推扩至国,从而实现家国同治。依此可见,郭嵩焘依然是循着传统儒家家国同构的思路来打通齐家与治国的。所不同于前贤的是,他十分明白地将“齐家”与事功关联起来,将“齐家”向“事功”方向引入,显示出其因应时变诠释经典的特殊诉求。

我们再来看郭嵩焘对“治国”的解读,相较于朱

子对“治国”的简单化解读,郭嵩焘则着墨甚多,他的关注点有二:一是对“机”的把握,二是次序问题。就前者来说,郭嵩焘指出:

机者,发动所由,发于此而动于彼,所谓圣人运量也……其机如此,只操在一人身上。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功用,只在机之发动处,着实不差……《大学》于治国章发明一机字,皆是如此,尽古今天下治乱之数。先儒但以感应之理言之,非也。<sup>[18]747</sup>

在这段引文中,郭嵩焘实际是在推衍朱子之意。他认为朱子讲“机”只讲到了“机”的内涵,但没有将“机”所蕴含的“条理节目”开显出来,这容易导致诠释不足,没有为学者指明具体的步骤和阶梯。而郭嵩焘则对此予以详细说明:

求诸人,非诸人,便是治国大头脑。五礼之施,五刑之设,皆由此出。《大学》吃紧于此说个有诸己、无诸己,乃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功夫。一毫假借不得……其所以求之人者,要皆自己,而推所以非之人者,亦皆自己。而推斯以为成己成物,内外合一之理。治国之道,只在教民为善,禁民为不善。<sup>[18]748</sup>

郭嵩焘认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就是“求诸人,非诸人”,而“求诸人,非诸人”的核心就是君主的德性涵养,然后层层向外推进,成己成物。尤其是指明治国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教化民众向善,禁止民众为不善。郭嵩焘的这种解释着意要凸显的是治国的方法和步骤,尤其是强调循序渐进,不容躐等之意。由此可见郭嵩焘意欲开掘《大学》经世的良苦用心。

就“平天下”来说,郭嵩焘依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指出“平天下章说个‘挈矩’之道”<sup>[18]749</sup>,这就把“挈矩”之道作为平天下章的核心。那么,何谓“挈矩”之道呢?郭嵩焘指出:

挈矩之道,须是以此度彼,使各得其分,非但如恕字之推此一心,以度之人而已……夫上下前后左右之各适其宜,无他,礼而已矣……于治国章言教,平天下章更不及政教字,而惟约其义于挈矩二字之中。上下前后左右尽人有个相处之法,圣人之以规矩法度整齐天下,亦即出乎其间,未可仅以推己度物之义囿囿看过。<sup>[18]750</sup>

很明显,郭嵩焘对“挈矩”之道的理解已然不同于朱子的推己度物之义。朱子强调的是无差别的对待,而郭嵩焘着重强调的是差异,因为在他看来,平

天下涉及处理各种关系,而不同的对象情势不一,绝对不能简单地用朱子所谓的“推己及人”来处理。可见,郭嵩焘实际上更加务实,更加贴合时代地来解读“挈矩”之道。要之,朱子处理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相对简单,以“推己及人”作为共同的原则来规范三者,而郭嵩焘不仅意识到不同条目的特殊所在,更为明显的是从政治层面、事功层面解读三者,显示出与朱子迥异的学术取向。

#### 四、《大学章句质疑》的思想史意义

晚清的学术格局是多元并存的,呈现出汉学式微但依然余响不断、宋学复兴但未至极盛、今文经学缓慢崛起的学术态势。更为重要的是,晚清风雨飘摇的社会现状急需能够经世的学问。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郭嵩焘循着传统士大夫的“依经立说”的学术进路,通过重新诠释《大学》、整合义理来寄寓其现实关怀。他的《大学》诠释呈现出如下特质:一是汉宋兼采,二是导向经世,三是依违朱子。而这丰富又多元的特质也使其《大学》诠释显豁出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郭嵩焘的《大学》诠释融入时代元素,将汉学、宋学以及经世致用之学打并融会,彰显出其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三者的努力<sup>②</sup>。《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书乃“兼存汉宋,无所依阿”<sup>[19]565</sup>,郭嵩焘的这种努力是否成功仍可再议,但其借经典诠释以推阐治世要义的苦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曾直白地指出,“治经当求通圣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则志固无由通”<sup>[20]</sup>,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大学》诠释的新面向,将《大学》在尽可能的诠释方向上提揭出来,尤其是着重提揭了《大学》的经世面向,与以往那种专从心性之学维度诠释自是不同,成为晚清多元交织学术背景下经典诠释的一个典范。

其次,郭嵩焘的《大学》诠释亦为晚清“理学中兴”视域下如何审视朱子哲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式和角度。作为官方哲学,在上行下效的夹持下,朱子哲学很容易陷入“此一亦述朱,彼一亦述朱”<sup>[21]</sup>的固化局面,这在明初就已经有所体现。而在晚清理学再度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对待朱子哲学自然是需要直接面对的。郭嵩焘《大学》诠释所展现的以审慎、理性的而非宗教般狂热态度待之,既不



愿效仿那些“学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而私自说”<sup>[22]</sup>的门户之见，更不愿与“专求异于朱子”<sup>[18]</sup><sup>599</sup>之徒为伍，而是主张以尊经亦即所以尊朱子的态度视之，这无疑是着了时代先鞭，成为晚清对待朱子学的一种较为理性的可取的态度，故而学者称其“治学态度尤为难得”<sup>[19]</sup><sup>565</sup>。

最后，从郭嵩焘经典诠释这一个案中，我们亦可以窥见经世之学在晚清已然成为显学，即使相对书斋式的注经亦被灌入浓郁的经世色彩，这也就说明每逢世道浇漓之际，经学所本具的经世致用色彩会得到格外的放大和重光。要之，郭嵩焘的《大学章句质疑》因其卓越的经学成就，“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sup>[23]</sup>，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成为透视晚清学术思潮鲜活而具体的个案。

#### 注释

①在朱子这里，“致知”并不是独立于“格物”之外的功夫，它只是“格物”的结果而已。就如同“吃饭”和“食饱”的关系。②范广欣亦有类似的想法，但他认为义理、考据和经世之学三者分工和并存，但以经世之学为主导。参见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们的经世思想》，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1 页。

#### 参考文献

[1] 严佐之. 清郭嵩焘注《近思录》及其“宗朱”之学[J]. 历史文献研究, 2016(37): 16.  
 [2] 郭嵩焘. 朱子原订近思录: 卷二[M]. 辽宁省图书馆藏清末抄本.  
 [3] 郑照. 生斋自知录原序[M]//方桐. 生斋自知录. 1875(清光绪元年)武昌藩署刻本: 1.  
 [4] 潘德舆. 任东涧先生集序[M]//养一斋集: 卷十八. 1872(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6-7.  
 [5]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6] 吴廷栋. 答宋雪帆阁部书[M]//拙修集: 卷八. 1871(清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刻本.  
 [7] 蒋琦龄. 中兴十二策疏[M]//王云五.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 第 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  
 [8] 李元春. 学术是非论[M]//时斋文集初刻: 卷 2. 1824(清道光四年)刻本: 1.  
 [9]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九十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8570.  
 [10] 曾国藩. 书信二: 答夏弢甫书[M]//曾国藩全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1576.  
 [11] 梁小进主编. 《大学章句质疑》序言[M]//郭嵩焘全集: 第 2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725-726.  
 [12] 王先谦. 《大学章句质疑》后序[M]//郭嵩焘全集: 第 2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728.  
 [13]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4]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M]//郭嵩焘全集: 第 11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408.  
 [15] 朱杰人等编.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58 答宋深之(五)[M]//朱子全书: 第 2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773.  
 [16] 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84.  
 [17] 王守仁著, 吴光等编. 大学古本序[M]//王阳明全集: 卷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42.  
 [18] 郭嵩焘. 大学章句质疑[M]//郭嵩焘全集: 第 2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19] 经部: 上册[M]//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20] 郭嵩焘. 养知书屋文集: 卷十[M]. 台北: 文海书局, 1961: 23.  
 [21] 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 1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48.  
 [22] 方勇评注. 庄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459.  
 [23] 陈澧. 《礼记质疑》序[M]//郭嵩焘. 礼记质疑.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4.

## The Retorting of Guo Songtao's *DaXueZhangJuZhiYi* to Zhu Xi and Its Meaning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Li Jingfeng      Liu Jun

**Abstract:** The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Zhu in late Qing Dynasty broke through the constraint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scholarship of Han to flourishing and reviving. How to deal with Zhu Xi's doctrine, and how to respond current malpractice became the necessary time topic for Neo-Confucianism grou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Guo Songtao. Guo closely clung to the *DaXueZhangJu* which was the core of Zhu Xi's philosophy system, faced pragmatism with the manner of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nd launched a systematic retorting of Zhu Xi's philosophy system, which showed the distinct peculiarity of deviating from Zhu Xi. On the one hand, he interpreted *Da Xue* from a new dimension with the angl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fter integrating the Han studies, the Song studies and the pragmatism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h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Zhu Xi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ival of Neo-confucianism. More importantly, his example showed the strong color that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te Qing served the realistic politics.

**Key words:** Guo Songtao; *DaXueZhangJuZhiYi*; Zhu Xi; contradict and query; pragmatism

责任编辑: 涵 含